

“杂语”的意义：文学发展史视角下的 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研究

欧阳可憭

内容提要： 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价值不仅体现在对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呈现和阐释，更重要的还在于表现本民族文学在发展过程中与外界的交流融合后形成的给本民族文学内容、形式带来嬗变的文化理念内容。就小说而言，这是一种多内涵的“杂语”呈现。文学史既是时间的、也是空间的，而一个时代的文学写作也应当具有更多的“杂语”形态。

关键词： 杂语 文学史 小说叙述 对话

笔者在与维吾尔族学者的交流过程中，发现他们都认为文学只有在一个多种文化相互交流的环境中才能够得到比较大的发展。比如，他们认为在维吾尔文学的发展过程中，18、19世纪被称之为清代时期的维吾尔文学处在一种相对封闭的文化环境下，与10~12世纪的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维吾尔文学有明显的差别，不如早期的维吾尔文学成就高，因为10~12世纪是一个多种文化交流相对比较多样和交往频繁的时代。在许多维吾尔族学者看来，就维吾尔古典文学而言，她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开放性，在文学中表现出了多种文化的因素。“她不断吸收外来文化的营养，提高丰富自己的文学层次。她与中原文化、波斯、阿拉伯等地区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许多作家用几种语言进行写作。”^①在这里，我们不妨把阿扎提·苏里坦的“文学层次”理解为文学形式或文学样式。因为，从文学史看，任何一个民族文学的丰富提高首先总是在文学形式上进行突破的，而这种文学形式的突破又一般首先表现为文学语言运用的变革、文学语言与日常生活语言互为交织的陌生化，以及多种外来语言相互重叠、并置、交叉、模糊释义的状况，使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民族文学处于一种杂语的状态。就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而言，笔者觉得既要把它放在纵向的本民族文学发展史上进行考察，也要放在横向的多种文化交流的历史空间里进行考察。

① 阿扎提·苏里坦：《二十世纪维吾尔文学史》，乌鲁木齐：新疆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1页。

—

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中最为注目的是小说的大量创作,现代小说作为少数民族文学的一种样式在 20 世纪新文学中出现,标志着少数民族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对来自不同国家、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多种文化的认同接受。就 50 年代后的新疆维吾尔文学而言,“解放后的维吾尔文学,在内容和形式方面都显著地丰富起来了。作家和诗人在进行创作时,都竭力地为充分利用文学的各种形式和体裁而作了努力;近来开始在形成散文和戏剧文学形式中,获得的某些成就,就是现今维吾尔文学在其发展中所获得的比较大的成就。”^①当时,丁朗作为新疆当代文学发展过程中早期最具批评意识的评论者,当他看到祖农·哈迪尔的小说《锻炼》被汉译发表后^②,马上对这篇作品进行了评论,他发表了《试评〈锻炼〉》一文。在这篇评论中,丁朗对祖农·哈迪尔塑造的人物麦提亚孜性格的双重性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祖农·哈迪尔在小说叙事中继承维吾尔民间文学传统予以了极大的肯定。同时,从时代政治因素考虑,丁朗把这篇小说称之为是“维吾尔社会主义文学的”“基石”,还认为祖农·哈迪尔在这篇小说里表现了“新人道主义精神”。^③丁朗对这篇小说的肯定现在看来是恰如其分的,是一种美学价值的分析判断。

当祖农·哈迪尔的一些作品陆续被汉译发表后,陈柏中与秦俊武合作,以笔名陈箭、秦弦发表了《谈祖农·哈迪尔的创作》一文,这篇文章发表在《天山》1959 年 10 月号,文章发表后很快在 1959 年第 6 期的《文学评论》上全文转载。这是第一次较系统、全面地向全国文学界介绍维吾尔现代小说奠基人祖农·哈迪尔的文学成就,这篇文章的价值不仅在于描述了祖农·哈迪尔的创作道路、创作成就及其先驱者的地位,更主要的是对其代表性文本作了相当细致的美学分析,对祖农·哈迪尔创作性地继承维吾尔文学传统而形成的艺术风格做了较为精到的概括。如,在陈柏中二人看来:《锻炼》是反映维吾尔农村互助合作运动的。但是,祖农·哈迪尔并没有去正面描绘这场斗争的过程,而是通过一个游民麦提亚孜怎样由懒汉转变为一名好社员的动人描绘,表现了这一斗争在人的精神品质、心理状态以及相互关系上所引起的深刻变化,其中不乏戏仿、讽刺的人物对话。这既符合小说表现人的命运、人的性格的规律,又是从当时维吾尔农村的生活实际出发。因为旧中国的维吾尔农村,已经濒临经济破产,不少农民不堪重负而被迫离开土地,成为无业游民,靠零星地出卖自己的手艺糊口。土改时这些游民又重新获得土地,在农村定居下来。怎样改变他们懒惰、自由散漫的习惯,使其成为

① 铁依甫江·艾里由夫:《略谈今日的维吾尔文学》,维义译,《天山》1957 年 2 月号。

② 祖农·哈迪尔的小说《锻炼》汉译文发表在 1957 年 4 月号的《天山》上,由尤素夫·赫捷耶夫翻译。

③ 李定朗:《试评〈锻炼〉》,《天山》1957 年 6 月号。

勤劳、智慧的新农民,自然成了互助合作运动中遇到的一个社会问题。祖农敏锐地抓住这个特殊的矛盾,精心刻划主人公麦提亚孜独特的艺术形象,挖掘他内心世界的细致变化,从而显示五十年代初中国共产党的农村合作化政策在新疆维吾尔族农村的胜利。这是一个新社会带来的人物,是时代变化的标志性人物,这正是祖农取材角度的独到之处及他对生活的独特而深远的理解。“从《筋疲力尽的时候》到《锻炼》,可以看出祖农顺应时代发展,其创作的思想倾向和艺术风格发生了质的变化,但他坚持‘文学是人学’的原则,遵守现实主义的创作精神,努力塑造具有典型意义的人物形象,则是一以贯之的。他的这种开创性努力,已成为维吾尔小说创作的优良传统。”^①现在看来,祖农的《锻炼》中所包含的社会时代意义和对本民族文化精神的认识都是非常有深度的,他的这部作品是对中国当代文学中农业合作化运动叙述的一个丰富,因为作品所具有的极具区域性特征的民族文化的时代性内涵,使得其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价值。

沿着当代维吾尔文学发展的历程,可以看到,小说作为极具个人自主性的文学形式,是现代重新协调任何一个民族史诗叙事方式特质的形式;小说取代史诗的根源在于历史的必然性,因为小说比任何其他形式更能使作者的想象自由驰骋。而小说要做到叙事的自由就必须是杂语的多重叙事,就必须是民族文学传统话语与时代社会交往话语结合的共同叙述。随着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及市场培育和消费的推进,同时,也随着新疆各民族在日常生活中相互交往内容的日益频繁和深入,当代维吾尔小说也日趋丰富多样、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因为“小说的繁荣总同下述事实联系着:语言和思想的稳定体系出现解体;与此相反,无论在标准语内外,语言的杂语性又都得到加强和意向化。”^②1986年,穆罕默德·巴格拉西发表了中篇小说《我,滞留在死人瞳孔上的影像》^③,这篇小说在虚构叙事、叙述话语表现上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小说,用作者的话说:“是追求一些现代派的,属于精神方面的写法,就是西方的表现方法。”^④这是一次维吾尔小说叙述话语模式的变革,在维吾尔文坛产生了很大的轰动。巴格拉西这个中篇小说的意义在于通过多重话语叙述,使得小说文本的表现空间和阐释空间增大,自身具有了极大的开放性,通过杂语实现了在新的社会历史生活条件下对维吾尔人精神世界的完整丰富把握。由此,巴格拉西也被称之为是新时期开始后的当代维吾尔新潮小说的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对后来的维吾尔小说产生了很大影响。

而在维吾尔族作家亚森江·萨迪克的中篇小说《干涸的河流》中,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通过

① 陈箭、秦弦:《谈祖农·哈迪尔的创作》,《天山》1959年10月号。

②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59页。

③ 穆罕默德·巴格拉西:《我,滞留在死人瞳孔上的影像》,《中国西部文学》1986年第12期。

④ 欧阳可惺等:《民族叙述:文化认同、记忆与建构》,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341页。

多重叙述话语的对话,达到对含蓄的或隐或现的民族意识的肯定。这是一个反映现实维吾尔族农民生产状况与民族想象结合的小说,其中有民族精神的贯穿性表达,在小说文本中,话语结构上一来一往、反复出现的关于阔坦冬村“半条河”提示性的警句,既是戏仿,也是对话,富有象征意味,这个“半条河”是民族地域性特征的产物,也是民族精神认同的象征:“河水依旧奔腾,但失去了往日奔放、自由的节奏和气势恢宏的旋律。带着伤感、沉默和忧伤低吟。……河流已经枯竭,它失去了往日的欢乐和波涛,没有了低沉的忧伤和悲哀,脉络里连一滴血都没有了。”最后结尾:“是的,河流早已干涸,那次快的涛声已成为远久的记忆,它低沉的悲哀也已是古老的故事,它的血脉里一滴血都没有了。”^①在小说的最后,叙述人安排了阔坦冬村寒冬季节里打雷下雨,从来没有出现的怪事出现了,然后是象征着权力符号的乡长被火烧死。在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虽然不十分明晰却是民族意识渴望表现和对话的话语,而所有这些逐步形成的民族意识都是在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产生的。随着叙述的推进,文本中关于“半条河”的话语在重复中把民族的家园意识逐步强调,在家园被毁的结果后面,表现的是通过捍卫民族土地家园、民族生存的生态环境,唤起更多人对民族情感共同体认同的记忆。这是一个叙述话语进入到对话网络里的推进积累过程,虽然民族意识不是直接鲜明和完整的表达,但是同样在文本中可以被感知到无所不在的民族主义意识含蓄蕴涵、积聚推进的动态性存在。在这时“话语将是最敏感的社会变化标志,包括那些变化还只是在逐渐成熟起来,它们还尚未完全形成,还没有探寻达到已形成的意识形态体系的领域。话语——是一个环境,在那里慢慢在数量上积累着一些变化,这些变化还没有达到新的意识形态的本质,还没有产生新的意识形态的形式。话语能够记录下社会变化的一切转折的最微妙和短暂的阶段。”^②实际上,只要在一些民族文学作家文本中进行细致解读,我们都可以看到这样的民族意识表现的阶段性过程。进入到 21 世纪,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出现这种情况是最为真实、正常的,因为正是这样,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才会真正丰富、深邃起来。

“杂语”作为巴赫金的理论观念之一,具有十分重要的内涵,它强调的是在小说叙述的多种话语表达中,人类话语的意义是如何从单一性逐步走向了多样性、对话性。巴赫金通过对欧洲叙事文学发展的梳理,认为小说逐步由单一性的神话、传说、史诗性叙事走向多重叙事。在巴赫金看来,陀思妥耶夫斯基诗学的基本特点,就在于他打破了一般小说所要求的材料的有机统一;把不同性质、互不相容的因素结合在一部小说的整体结构之中;打破了统一而完整的叙述格调,是对话型的。这种小说不是某一个人的完整意识,尽管他会把他人意识作为

① 亚森江·萨迪克:《干涸的河流》,狄力木拉提·泰来提译,《民族文学》2006 年第 9 期。

②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二卷,李辉凡、张捷、张杰、华昶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59~360 页。

对象吸收到自己身上来。这种小说是几个意识相互作用而形成的总体,其中任何一个意识都不会完全变成他人意识的对象。显然,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中小说叙述仅强调本民族历史社会与民族内部生活材料的统一完整性,仅仅是本民族的单向叙述是不够的。因为每个民族间现实日常生活的交往性存在决定了我们的少数民族文学从内容到形式都是永远不断发展、变化、丰富的。

在笔者看来,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都应该是一个整体,缺乏对文学文体形式的发展演变的研究是不完整的研究。我们从小说文本话语的“杂语”性质反过来还可以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一个民族的语言与一个民族文学的关系,一个民族的文学语言与本民族语言是有区别的,现代意义的小说是多种语言融合的产物、多种文化交流的产物,杂语是作为现实日常生活中各民族之间交往过程中活生生的具体语言行为。在“杂语”的前提下,写小说才能够具备充分运用人类语言文字的技巧,才能够获得多样叙事的最大可能。这个杂语的形式是各种语言语调、词汇、风格争夺发言权的场地,在这里,我们如果把各民族文学的小说文本语言切割粉碎后仔细观看,就会发现:现代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是时代的产物,也是时代的叙事,是一种“杂语”存在形态的叙事。例如从维吾尔族 20 世纪以来的文学史看,在伊犁生长的作家创作在整个维吾尔文学中占一定的地位,已形成具有独创特点的创作队伍——“伊犁作家群”。伊犁作家群的文学创作具有欢乐的情绪、勃勃的生气、幽默的性格等特点,而这些是与伊犁本土地方语言文化的特征分不开的。^①伊犁本土语言文化自身就是一个充满了多种文化交流的产物。从伊犁作家群作家作品的“杂语”构成的基础看,有伊犁民间传统的以“恰克恰克”为名的维吾尔民间笑话艺术语言,还有伊犁的地方民歌。伊犁民歌语言优美、内容精致、富于音乐般的节奏,是新疆各地维吾尔地方民歌中的一朵美丽的奇葩。^②另外,在伊犁维吾尔现代文学中表现的本土语言里不仅有大量的来自其他突厥语族民族语言的借词,也有许多俄语、汉语、蒙古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借词。各个不同民族蕴含丰富文化的借词汇集在伊犁本土语言中,使得伊犁本土语言文化具有独特的语言艺术感染魅力。

在伊犁维吾尔族作家祖尔东·沙比尔的长篇小说《故乡——母亲》^③中,我们就可以看到“杂语”的叙事、叙述。这篇小说是以 20 世纪 40 年代在伊犁发生的“三区革命”为历史背景

① 伊犁的维吾尔语被称为维吾尔语的伊犁次方言。在伊犁次方言中,除使用现代维吾尔标准语中的大量词汇以外,还包含着伊犁维吾尔人经常使用的部分方言词汇。伊犁次方言是一个具有文化多元性、混合性和复杂性的方言。

② 尼加提·苏皮:《维吾尔语伊犁次方言语言文化研究》,新疆大学博士后研究工作报告,2013 年,第 156 页。

③ 祖尔东·沙比尔的这部三卷本长篇小说 2000 年 11 月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

的,小说中除使用了现代维吾尔语标准语里的大量词汇外,还使用了伊犁维吾尔人经常使用的部分方言词汇。由于 20 世纪 40 年代是俄语对维吾尔语的影响达到最高点的时代,所以,小说中出现了不少俄语借词,因为小说叙述的事件是当时的战争,这些俄语借词中占重要地位的词汇都是与战争有关的。此外,在小说中还有许多汉语、蒙古语、哈萨克语、塔塔尔语、阿拉伯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借词。这些借词的大量广泛使用使得小说人物形象更加活泼,具有强烈的地域感和时代感。祖尔东·沙比尔作为一个成功的作家,十分明确现代民族叙事就是多民族交往的叙事、是“杂语”存在形态的叙事。当然,从修辞上看这里的杂语还仅体现在人物和情景的叙述上,对话的成分虽然也有,可还停留在一般的语言结构表面层次上,小说的叙事基本上还是统一完整的叙事,语言的文学性占据着主导地位,属单语小说。但是,这篇小说正在努力向多重叙事的方向发展,其对话性的成分已略现一斑了。

二

现代性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应该把一个民族文学历史的演变与时代环境的关系放在首要的位置,而不能孤立地去研究某个民族文学的传统经验或规律。20 世纪 50 年代,在对待民族遗产的问题上,维吾尔族诗人铁依甫江认为:“我们应当把学习民族遗产当做一项具有重大意义的重要任务来看待。同时,要加强对兄弟民族文学中的丰富多彩的形式的学习和对各族作家、诗人的高度技巧的学习。”^①其观点十分明确。

当时,阿黑买提·孜亚对维吾尔古典文学发展的几个阶段进行了描述,他把维吾尔古典文学分为四个转折点。他认为,14 世纪末叶到 15 世纪的 70 年代是维吾尔文学的第三个转折点,“这个阶段可以说是维吾尔古典作家喜爱外语的时期。这时期,人民中间歧视本族的语言、喜欢外语的错误现象得到了扩张。我们的语言也受到阿拉伯和波斯语的侵袭,许多作家和学者都喜欢用阿拉伯语、波斯语写作。因为伊斯兰教传入后,由于古兰经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注释也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而且流传在广大的人民中间。所以当时崇拜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到了这样的地步:倘若有人赞扬本族语文具有伟大和美丽的特点,以及实际证明这些特点的人,就会遭到公开的攻击。那些崇拜外语的人们,起初把纳瓦依的诗歌也讽刺为‘德黑兰城里骑着驴的艾尔西’写的。为了把潮流纳入正轨而展开了斗争,这个时期,伟大诗人纳瓦依,便打击敌视本族语言的现象,而用本族语言写作。所以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文学争论时期’。……古典文学的第四个转折点是在 15 世纪末期。从纳瓦依用本族语言创作活动开始,基本上结束了反对根据本族语言创作的错误思想,肃清了在文学上崇拜外语的错误观

^① 铁依甫江·艾里由夫:《略谈今日的维吾尔文学》,维义译,《天山》1957 年 2 月号。

点。”^①维吾尔古典文学从纳瓦依后,用本族语言写作的趋势逐渐扩大了,风格上也逐渐清除了外语的影响。在阿黑买提·孜亚的描述过程中,也可以了解到新疆解放后的部分维吾尔族文学作家、知识分子对待非母语的基本态度:“从15世纪开始,用我们本族的纯洁语言写作的道路日益在巩固着和发展着,今后还要继续发展和巩固下去。”^②这是一种民族主体自我意识的表达和文化民族主义的追求,本身无可非议。但这种意向和追求是很难在现代文学中被一以贯之的。在古典诗歌文学时代,其写作体裁是比较单一的诗歌形式,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写作确实能够保持住自己本民族文学的特征,维护本民族文化的存在和发扬;而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文学已经无法脱离“他者”文学的存在影响,也无法在自己的文学实践中得到本民族语言及意识形态话语“纯正”的实现。而实际上,当年的纳瓦依即使采用本民族语言创作,其诗作中也不乏来自“他者”存在的影响。

对于民族文学发展与继承本民族传统、学习借鉴他者文学的关系,铁依甫江·艾里由夫曾经有过这样的描述:“在创立和提高新的维吾尔文学的道路上,我们的作家和诗人们,首先是从自己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学典范中吸取重要养料的。但同样地,他们也尽一切可能去学习汉族文学、俄罗斯文学和苏联文学以及世界先进文学的典范著作。现在维吾尔作家都把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艾青、赵树理等作家、诗人当作自己的导师,以极大的兴趣学习他们。”^③我们结合当时新疆维吾尔文学的存在情况看,这种描述确实反映了新疆当代维吾尔文学的实际状态。

在20世纪50年代,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和理论批评者非常活跃。就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而言,当时新疆民族作家的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实践构成与苏联文学理论和批评基本一致:“作为新中国文学的一个不可分离部分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各民族人民的现代新文学,在形成的过程中,受到了苏联文学的巨大影响。应该坦白地说,我们差不多没有一个不是或多或少地读过一些高尔基或是马雅可夫斯基、塞·艾尼或是阿依拜克、穆·艾维佐夫或是萨·木卡诺夫、努尔·伊斯拉伊里夫或是玉麦尔·麦罕默德的作品之后开始写作的。当我们读到我们新时代文学的代表人物罗特布拉·穆太里夫(注:又译为黎·穆特里夫)的诗作时,我们就会感觉出它和马雅可夫斯基以及苏维埃塔塔尔诗人哈迪·塔赫塔西的政治抒情诗起着共鸣的铿锵的声韵。”^④显然,现代意义上的维吾尔族文学不管是在文学理念、还是在文学表现上都

① 阿黑买提·孜亚:《维吾尔古典文学的发展状况和学习古典文学的意义》,张周、柯仁合译,《天山》1957年10月号。

② 同上。

③ 铁依甫江·艾里由夫:《略谈今日的维吾尔文学》,维义译,《天山》1957年2月号。

④ 孜亚·赛麦迪:《苏联文学是我们的榜样——在庆祝十月革命文艺晚会上的讲话》,李雍译,《天山》1957年12月号。

与传统的维吾尔文学有了本质上的区别。这时的文学反映的是“生活中存在的原则上不同却又相互联系的两个价值中心,即自我中心和他人中心;一切具体的生活要素都围绕这两个中心配置和分布。”^①这种区别在叙事文学中体现得最为显著,而最为突出的显著性标志是伴随着现代维吾尔小说文本出现并始终在不断丰富发展的杂语,杂语分裂了话语的指物表意功能与情意语调功能之间的对应关系,使得现代维吾尔文学文本中的话语不再表现单一的对应关系,而包含了其他的意义和评价,具有了离心力,具有了一种异质存在,这种异质性的话语存在使得维吾尔文学获得了一种交替变更的自由和新生。

从欧洲小说历史的发展过程进行考察,巴赫金认为一个民族语言之外的杂语是影响小说发展的真正重要之物,杂语作为民族语整个的方言构成,它的出现是不同民族交往、各种文化交流的产物,是人类历史进步的体现,杂语打破了封闭的一个中心,使其进行了分化。在笔者看来,作为一种研究文学的一种视角、一种思维方法,巴赫金的杂语理论是我们从事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基本的理论。虽然,杂语理论是建立在对西方文化即对欧洲小说历史发展的归纳总结上,但它在中国新疆、西藏这样的区域——历史上多种中西文化长期交汇交流之地,就具有鲜明的指向性和良好的适用性。在笔者看来,在 20 世纪现代社会的背景下,新疆多民族现代文学中的“杂语”包含的语言形式意义实际上更多地具有现代化进程中民族文化现代性反思的意味。因为杂语,“会削弱传说和传统的威力(传说和传统仍还拘束着语言意识),瓦解民族神话体系(民族神话是同语言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并且要彻底破坏语言和话语带来的神奇魔幻的感觉。同他族的文化和语言(这两者是互为依存的)密切接近,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意向和语言的分离、思想和语言的分离、情态和语言的分离。”^②巴赫金认为,在任何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中,“语言也受到神话思维形象的控制,这些形象约束着语言意向的运动,使各种语言范畴难以获得普遍性和灵活性,较难具有纯粹的形式性质(这是语言范畴同具体的事物联系融为一体的结果),也限制了话语表现情态的可能性。”^③在这里,巴赫金语言“纯粹的形式性质”是语言范畴同具体的事物联系融为一体的结果,是多语现象和与此相关的不同语言的相互映照。就小说而言,在笔者看来,即是文本中的诸多叙述者既作为叙述者又作为被叙述对象的具体话语,是一种在小说文本中最能够体现隐含作者意味的社会性杂语现象,也是文本的叙述修辞;它们是各个民族、各个时代、各种阶层、各种行业、各种文体等多种话语的共存,它们在小说文本中相互映衬、依托和相互激发,形成了小说文本有意味的

①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晓河、贾泽林、张杰、樊锦鑫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73 页。

②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白春仁、晓河译,第 157 页。

③ 同上。

形式。这个有意味的形式不仅在土耳其的奥尔罕·帕慕克那里,在维吾尔族作家穆罕默德·巴格拉西、亚森江·萨迪克,藏族作家阿来、格绒追美等人的小说文本中也都可以看到。在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无所不在的歧语和杂语世界中,在区域性的少数民族间日常生活的交往中,在传统的民族神话发生解体、衰落和面对当代社会价值观、信仰多样存在的选择过程中,“杂语写作提供了另类的、可替代的再现于自我表述的可能性空间”^①,它使得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语义内涵越来越丰富,小说文本的表现空间和阐释空间也越来越大。虽然,不可过高评价杂语写作在当代少数民族小说中的价值与意义,但从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看,进入到巴赫金杂语理论体系描述的层次中去应该是一个现代少数民族小说文本必须有的进程。在笔者看来,由于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不同,“大民族”语言与“小民族”语言的关系不同,使得一些少数民族文学更愿意追求民族文化和身份政治的意义,会自觉地在文学上凸显自己民族的个性,有时甚至回避各民族间现实日常生活的交往性存在,追求民族文学单边叙述的本真。同时,当代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与后现代理论所描述的状态是截然有别的,各民族间并不存在压迫、对峙的关系,只是存在主流中心与边缘、边缘与边缘之间不间断地互动关系;从区域性社会的特征看,既是在边缘的跨体系社会里仍然保持着与主流中心社会密切的互动关系,这是中国社会历史递进过程中的一个显著特征。所以,对当代少数民族文学而言,目前重要的是能够看到文本中具有更多的不同民族话语层次之间的各种对话交流,在我们的小说文本中能够有更多的杂语呈现多民族关系的多边叙事。

文学作为语言的艺术,在各个民族文学的发展历史过程中都离不开与他者的联系和互动。从历史上看,因地理空间的相对隔绝封闭,以及不同民族社会的相互屏蔽,在各个民族的原始阶段,文学曾享有过单个民族文学本体意义上的个性发展条件。“然而,这种一民族文学不为外民族文学影响的个性化推进是难以维持久远的,文学作为诸民族间精神文化接触中尤其易感的部分,常常会在不同民族的过从中,感染或接种上对方的基因。正像‘金无赤足’一般,在古往今来愈来愈见出整合趋向的中华多民族文学交流进程中,可以不再指望会辨认出某一民族的某一作品,还属于纯而又纯的‘单一基因’的民族文学标本。”^②关纪新的这番话概括了人类各个民族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和趋向,可谓是语重意远。

可是,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一些要维持本民族语言纯正性的说法和主张:即反对本民族语言中的借词等外来语,要保护民族语言本真性;在文学写作上要净化民族语言,反对文学文本中的话语玩笑、戏谑、讽刺、漫画、戏仿等等。面对这种堂而皇之的文化

① 刘大先:《现代中国与少数民族文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第194页。

② 关纪新:《多元背景下的一种阅读:满族文学与文化论稿》,沈阳:辽宁民族出版社,2013年,第484页。

民族主义吁求和暗流性的潜在影响,我们不得不为一些民族文学的未来发展感到忧忡。

当然,就文学文本中表现本民族生活话语的词语而言,笔者是十分欣赏和非常理解民族作家和读者对本民族语言表达方式的习惯用法,这是民族文学之所以具有独特性的要素之一。在民族文学的生产和接受传播过程中,这种惯常的词语或使用或出现,都会使一个民族中的个体能有找到故乡的感觉,自己所有的感情都能在这里得到安放。因为在“对一个词语的应用与传承中,或许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民族的观念……纯净了一个词语,就纯净了一桩事物。稳住了一个句子,也就稳住了一份情感。……在词语和思维方式中站住脚的世界,才是最牢固的,在语言和习俗上保持其不变的特性,世界的关键就没有被改变。词语就像马鞍子、驴掌子,稳住它,脚下的世界就不会打滑。”^①这是一种让人迷恋的民族文化记忆,是在现代生活环境下对民族遥远历史的情感追忆。在笔者看来,日常生活中的词语既贴近现实又凿空现实,而文学倚靠这些词语又要超越这些词语,显然,这是文学存在的无目的之目的性追求。这时,对文学而言,人类情感的盲目性和激扬亢奋在文学文本中得到表现是普遍不过的语言修辞策略。但是,这种语言修辞的策略就等同于民族语言的本真性?语言修辞的策略就能够代替语言自身的真正生命?

在一个现代多民族国家内,在关于民族文化的本真性讨论问题上,塔米尔认为,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常常走得更远,认为他们的文化、道德以及政治是本真的,其字面的意思是:真实的、历史的、正统的、有机的、可信的、未被污染的、纯洁的、持久的,而且远远优越于所有其他民族的虚假的、非本质的、杂交的文化创造。例如,在 19 世纪的英国,人们广泛认同这样的观点:一个把他的阶级处境——不管是什么处境——当作自己既定的与必然的生活状况加以接受的人,将无疑是真诚的,他将是真诚与本真的,正因为本真所以才真诚。对此,塔米尔认为,“认为个体的身份是生下来就固定了的,这与作为自由、有选择能力的行动者,作为自己生命的创造者的个体观点是矛盾的。”^②显然,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下,在一个差异性构成的世界里,在同时还存在着方言差异的当代中国的各个民族语言面前,“绝对的独白——只为表现个性——是不存在的,这是唯心主义语言哲学从个人创作中引出的一种假象。”^③每个个体的存在都面对着多种选择的可能性。而选择的基础是因为生活、也是世界的本质是对话性的,我们面临的选择就是参与对话,对话交往是不同语言的真正生命所在。我们通过对话,不同的指物叙事和表情达意的内容在与他人差异性话语的相互作用中达到求异存同的存

① 帕蒂古丽:《词语带我回到喀什噶尔》,《民族文学》2014 年第 1 期。

② [以色列]耶尔·塔米尔:《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陶东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年,第 42 页。

③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四卷,白春仁、晓河、周启超、潘月琴、黄玫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195 页。

在,这个求异存同中的共同点“是观察世界的独特的视点,是通过话语理解世界的不同形式,是反映事物涵义和价值的特殊视野。”^①在这时,任何一个民族当中本真的人都应该是一个自己创造自己的人,对一个民族而言,不存在一个民族永远固定不变的生活方式,惟一的、本真的生活方式,就是每个民族中的每个个体为自己自由选择的生活方式。

而实际上,在当代少数民族小说文本中,杂语的出现使得“内容不变的同一个事物,生活的同一个因素,视其同我或同他人相联系而获得不同的价值。内容统一的完整世界,视其同我或同他人相联系而获得完全不同的情感意志语调,在自己最积极最重要的涵义中表现出不同的价值。这并不破坏世界在涵义上的统一性,却可使涵义的统一性提高到事件的惟一性。”^②在笔者看来,这个“事件的惟一性”,其实就是当代中国少数民族文学表达的不可替代性,就像穆罕默德·巴格拉西小说婉转细腻地表现当代维吾尔人丰富的内心情感和精神世界、亚森江·萨迪克小说用情生动地表现社会变革与维吾尔历史文化关系、阿来小说流畅隽永地表现嘉绒藏族土司制在现代中国社会历史中的轨迹进程、格绒追美细致真切地表现康巴流浪家族在地域文化融入当代文化的矛盾纠结中的命运一样,具有其独一无二的文学艺术价值。由于杂语的存在,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等待研究者解码的语义内涵才会越来越丰富,文学文本的表达空间和阐释空间也就越大,作品的艺术意味含量也随之增加,其少数民族文学的独特性更为凸显,成为中国当代文学不可或缺的重要构成。

最后,我们在讨论少数民族文学传统与杂语的关系时,要注意区别现代性意义上的少数民族文学创作过程中的作家文学与民间文学的特征,需要发现和了解少数民族文学作家是如何把自己本民族的民族文学传统体现在当代的叙述之中的,他们在当代叙述中有多少是来自于传统的,又有多少是来自于当代社会自觉的杂语实践,不仅要把少数民族文学作为一种传统文学来看待,也要把少数民族文学当作在全球化背景下的多元文化交流的产物。在笔者看来,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生产更多的是作家自觉的“杂语”实践,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要关注这种“杂语”是如何在一个民族作家的文学文本中被结构和被表现出来的,这种“杂语”作为历史文本状态在民族文学史中该如何建构性地描述和阐释。而这可能是中国多民族文学史研究的基本坐标。

(欧阳可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刘大先】

①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第72页。

② [俄]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一卷,第73页。